

《做书——感悟与理念（签名本）》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6年01月01日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胶订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23816554

编辑推荐

他如何带领团队高调参与《邓小平时代》空前的版权竞争，并推动其顺利出版，使这本时代大书轰动一时、得奖无数、产生了不可比拟的社会影响？

他如何打动散文大师王鼎钧先生，获得其系列作品版权，并让这位被严重忽视的作家得到应有的文坛地位，也让鼎公感念这份“雕虫化龙”的“引渡”之功？

他如何与杨绛、杨振宁、王蒙、金庸、李敖、李泽厚、刘再复、何兆武等名流大家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他如何发扬盗火传统，坚守人文精神，注重思想启蒙，秉持不官不商，激荡时代潮流？

三联原总编辑李昕先生，2013年度致敬出版人，浓缩三十多年从业经验，结合大量精彩案例，为读者揭开出版的神秘面纱，讲述那些我们喜爱的书的创生过程，以及出版人应有的使命、情怀、智慧和担当。书中的种种，是当代出版的缩影，也是当代文化的缩影。

内容简介

这是出版人的五堂课，爱书者的启示录。全书以讲座形式，讨论编辑应当具备的素质、修养和能力。

出版的理想理念，编辑的书事书情，做书的感觉感悟，尽在作者现身说法中，给人以启发和灵感。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以从事出版三十多年的丰富经验，结合大量精彩、鲜活的案例，讲述编辑的思路和策略、经验和教训。通过《邓小平时代》、《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等经典图书的出版过程，以及与杨绛、傅高义、杨振宁、王蒙、金庸、李敖、李泽厚、刘再复、何兆武等作者成功合作的故事，让你了解出版人应有的使命、情怀、智慧和担当，从而得窥出版的真义。

作者简介

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

从事编辑工作33年，是业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早年曾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组委会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和编辑学研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有一系列文学研究和编辑学论文以及文学创作散见于报刊，曾应邀在国内多所大学和多家出版机构举办编辑学讲座，深受好评。

目录

001 序言：一言难尽说编辑 蔡长虹

007 自序：我的编辑缘

001 第一讲：激情与悟性

“编辑的素质和修养”讲座

059 第二讲：策划先行

“编辑的能力”讲座之一

127 第三讲：功在案头

“编辑的能力”讲座之二

173 第四讲：以文会友

“编辑的能力”讲座之三

223 第五讲：创新与增值

“编辑的能力”讲座之四

007 自序：我的编辑缘

001 第一讲：激情与悟性

059 第二讲：策划先行

127 第三讲：功在案头

173 第四讲：以文会友

223 第五讲：创新与增值

275 三联的文化和传统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自序：我的编辑缘

我这大半辈子，作为知青下乡不算，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编辑。

1982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已近30岁。选择就业，当时有各种机会。60个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名额有16个，岗位则有政府部门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出版社编辑等。我当时是班长、党员，学习成绩不错，毕业论文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特别有利的条件是，全年级同学中只有我一人父母在北京。同时系里领导曾与我谈话，建议我留校，教外国文学课程，并承诺送我去美国进修。可以说那时我选择职业的优先权很大，想做什么都不难实现。但自我评估后，我觉得从政做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书生气也不适合经商，至于做学问，虽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因为“文革”10年，光在东北农村下乡就占了6年，被耽误得太惨，哪怕奋起直追，也属先天不足。在大学期间，我发现可能是因为从小爱读书也爱思考，加之先前已有一定的社会生活阅历，所以在文学评论方面，常常可以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若是以“才、学、识”来衡量，在同学里面比较，我的“才”比不上方方、王家新、高伐林他们，我的“学”比不上陈晋、杨胜群、乔以钢、於可训等一批人，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我或许不输给其他人。我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于是我决定做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班以后先做了10个月的校对，然后面临在出版社内分配工作部门。同来的6个大学生，只我一人是党员，所以格外受重视，很快被社领导看中，作为政工干部培养。分部门时，其他5人都如愿以偿地进了编辑部，只我一人被分到人事处。我没去报到，想找领导“蘑菇”一下。一天在大食堂，我见总编辑屠岸先生独坐一桌埋头吃饭，就凑过去。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做编辑的机会？我告诉他，其实我心理压力很大。武大毕业时，中文系教授陆耀东老师知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把我找到家里耳提面命，说那可不是一个好待的地方，干不好是会被踢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努力，云云，言犹在耳。我说我知道自己未必胜任编辑工作，但我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为了做编辑。我希望

能有一个机会，哪怕只是两三年时间，让我尝试一下，看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尝试失败，我会无怨无悔地做政工干部。屠岸先生听了，看着我，沉思了一会儿，只说了四个字：一言为定。于是，我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

1982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已近30岁。选择就业，当时有各种机会。60个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名额有16个，岗位则有政府部门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出版社编辑等。我当时是班长、党员，学习成绩不错，毕业论文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特别有利的条件是，全年级同学中只有我一人父母在北京。同时系里领导曾与我谈话，建议我留校，教外国文学课程，并承诺送我去美国进修。可以说那时我选择职业的优先权很大，想做什么都不难实现。但自我评估后，我觉得从政做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书生气也不适合经商，至于做学问，虽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因为“文革”10年，光在东北农村下乡就占了6年，被耽误得太惨，哪怕奋起直追，也属先天不足。在大学期间，我发现可能是因为从小爱读书也爱思考，加之先前已有一定的社会生活阅历，所以在文学评论方面，常常可以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若是以“才、学、识”来衡量，在同学里面比较，我的“才”比不上方方、王家新、高伐林他们，我的“学”比不上陈晋、杨胜群、乔以钢、於可训等一批人，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我或许不输给其他人。我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于是我决定做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极好的工作平台，不仅面对的作者大多是文坛耆宿、名家大师，而且编辑部中也是名流云集，严文井、韦君宜、屠岸、牛汉、绿原、楼适夷、聂绀弩、舒芜、蒋路、许磊然、刘辽逸、陈迩冬、王利器、龙世辉、王笠耘等老一代名编当时都还没有退休，一开会见到这么多令人仰望和崇拜的人物，着实让我震惊。于是暗下决心，向老编请教，从头学起。我在理论组，联系的都是文艺理论家，我记得自己编辑的第一套书是《胡风评论集》，继而又编辑了唐弢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等，同时与大批的作家、评论家建立了联系。其中很多人与我的联系保持了30年，例如王蒙、刘再复、李敖、冯骥才、杨义、阎纲、吴泰昌、杨春时、郭枫、白桦等，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基本上是我每到一个新单位，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14年，这段时间我被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同时积累起作者资源。看到自己亲手编辑的图书受到欢迎，引起反响，我感到很快慰，乐此不疲。这中间有两次机会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是1986年，担任清华大学外语教授的父亲通过美国友人为我联系好去美国留学，可以边当助教边读研，条件很优越；二是1993年，香港有位地产商要在北京开公司，建议我“下海”当老总。两次我都婉拒了，原因在于，我认为当编辑适合我。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位副社长退休，当时我是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社长陈早春找我说，“我是把你看作接班人的，你需要多方面的锻炼机会，来做这个副社长主管发行吧。”我说，“我不能脱离编辑岗位。”他说，“那我叫你兼管一个编辑室不就行了？”我说，“不行，我要以编辑为主业。”这样我就放过了一个提拔的机会。

派赴香港工作是轮换制度，8年后我被调回北京。临别时香港方面的领导找我谈话，问，“你一定要回北京吗？是不是可以考虑留在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设在深圳的公司？”北京这边，也有不止一家出版社欢迎我去做社长或总编（这样的事情以后几年在我担任三联书店副总编时又发生过两次）。但我一心向往北京三联，以为这是理想归宿，所以其他机构一概不考虑。实话说，若是换一种选择，要么收入高些，要么职级高些，总之都更为实惠。这些我并不在意，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做书的好平台，哪里能让我编好书我就在哪里。我在北京三联工作了9年，从副总编到总编辑，经手的图书又有1000多本，加上前期编的，总共应有两三千本吧。这些书秉承老一代三联人开创的出版传统，不仅领先一步、传播思想、启蒙社会、服务大众，而且追求一流、倡导新锐，受到社会好评。其中有不少图书是我亲自策划组稿，亲自编辑审稿，亲自营销推广的，也有一些图书是我绞尽脑汁、费尽周折、历尽辛苦才得以促其问世的。看到这些书，我感到欣慰，满足，无憾。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